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社会变革：

李提摩太在华宗教与社会实践研究
(1870—1916)

何菊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社会变革：

李提摩太在华宗教与社会实践研究
(1870—1916)

何菊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李提摩太在华宗教与社会实践
研究:1870~1916/何菊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161-5001-6

I. ①传… II. ①何… III. ①李提摩太(1845~1919)—
人物研究 IV. ①B979.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738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田 文

责任编辑 杨晓芳

责任校对 邓雨婷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社 址

邮 编

网 址

发 行 部

门 市 部

经 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100720

<http://www.csspw.cn>

010-84083685

010-84029450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45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出版受到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献给祖母和外婆

序 言

1870年2月，有一个25岁的年轻人，只身一人，离开大不列颠，以孤往之大勇，跨越大洋，来到具有悠久文明的东方大清帝国，进行他的宗教与社会实践活动。其后，他在中国待了46年，从基层社会活动开始，以独特的坚毅与能力，逐渐进入上层社会，被大清王朝授予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71岁（1916年）时，他因病回到英国治疗，1919年病逝。他就是李提摩太，英国浸礼会的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一生全部献给了上帝，同时也与中国结缘。李提摩太试图建立的上帝的天国虽未在这个具有几千年古老文明的国度降临，但这个帝国却选择性地接受了传教士宣扬的西方文明的深刻影响。李提摩太的文章、著作，以及他筹建的山西大学留存下来，成为他留给中国的遗产。斯人斯事，很值得认真研究。

何菊博士的这部著作，是国内外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运用人类学理论系统研究李提摩太在华宗教与社会活动的学术著作。本书以综合性眼光将其布道讲经、联结佛耶、传播西学、顾问改革、勾连世界的各种实践活动整合起来，探求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关系。作者指出，李提摩太将西方世界的扩张看作是上帝的光明之道，混淆了上帝之名与殖民之实。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无疑受到传教士等在华西人的影响，但其方向与路径皆非由西人指明与规定，而是由中国的治理精英与广大民众基于本土深厚的文化积淀并包容与融合外来文化才实现的。

这部著作从人类学的视角进入，在分析传教士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关系问题中获得了独特的存在价值。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比较成熟的解释模式主要有两个类型：一是“冲突—回应”模式（包括“传统—现代”模式和帝国主义模式），认为中国历史停滞不前，只有受到西方的冲击后才能进步，从而走入近现代社会。帝国主义是理解19世纪以

后中国历史上种种问题的总根源。二是“中国中心观”模式，认为要解释中国的问题，需要采取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准绳。这两种模式观点相左，但都是以西方中心主义为立场，以“二元论”为看问题的思维模式。在这种立场与思维方式的分类中，西方是中心，非西方是边缘，西方是现代社会的，非西方是传统社会。要使研究有新的进展，立场与思维方式的转换就显得十分必要。在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作者的努力。“内部的他者”是一个重要的分析性概念，这个概念非常精致，也非常有效，它的创新含义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内部的他者”是一种“无内无外”、“非此非彼”的状态，消除了内外、彼此的区别，否定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李提摩太进入大清帝国以后，就被包含于中国社会之内，成为中国社会的成员。他本来作为一个征服者出现，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被中国文化浸染与同化的被征服者。

第二，“内部的他者”是一种“亦内亦外”、“亦此亦彼”的境界，强调了无边界的融通功效。在“亦内亦外”、“亦此亦彼”的话语中，二元论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复存在了。李提摩太在没有进入清帝国内部之前，所代表的是西方文化，是外部力量的组成部分；当他进入清帝国内部之后，将外在于该文化系统的各种要素转移到系统内部，参与系统主体的改造，“亦内亦外”、“亦此亦彼”的境界就此出现。

第三，“内部的他者”强调“内”与“外”构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我们借用“太极图”来解释。这个图表面看起来黑白阴阳鱼对立显著，二者构成整体。如果将这个图也看成二元思维，那就谬以千里了。图形自己做出辩解：黑白二色的区分是象征性的，是符号式的，并不是本质性的，因为黑色鱼里面包容着白色的眼睛，白色鱼里面包容着黑色的眼睛。这就说明在太极图的整体中黑白混融不分。而最关键的是，只有这种整体——这种非黑非白、亦黑亦白的混融，才是无限变化的根源。李提摩太所代表的外来文化进入中国文化以后，与所接触的中国要素混融，构成了类似太极图的整体，这个整体是不能分隔的，非西非中、亦西亦中，由此才生出新的变化。

何菊博士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九年时光都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度过，专业涉及社会学、人类学。除李提摩太的研究之外，她自硕士阶段就在大理周城白族村做过较长时间的田野工作，其宗族研究颇有新见，在

《民族研究》上发表过高质量的研究文章。2013年6月去中国台湾地区参加学术会议，她的一篇宗族研究论文回应了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的理论观点，受到与会学者的重视以及台湾著名人类学家乔健先生的关注。

作为任何一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都需要关注时代特征。我们这个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的意义在于：由过去各地区分散发展的历史变成了世界范围的人类历史。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思想，他说：如果将工具的发明与火的取用看作第一次开端，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则是“二次开端”。第一次开端人类是分散的、地区性发展的，曾经出现了一个“轴心时代”，产生的思想雄霸了几千年；而第二次开端人类是整体的、世界范围的，亦将“走向另一新的轴心时代”。新的“轴心时代”必定产生不同于公元前500年前后的那个“轴心时代”的新的思想，它的出发背景是世界多元思想的相互碰撞与融通。我们的确需要在全世界文化的时间与空间之内来思考学科中的一切问题，并在这个大的时空背景之下，确定研究目标、寻觅新的人类精神、思考新的人类文化发展方向，这就是时代的使命。而在当代，人们似乎总是缺少一种“觉醒精神”。例如，本来可以给人们带来福祉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却被转化为战争与侵略（包括文化侵略）的工具；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污染、气候变暖、植被破坏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可是我们偏偏就要这样做；文化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以及形形色色、十分可笑的类似于“山羊式的”^①其他中心主义盛行；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战争的阴云依然徘徊在天空；如此等等。说人类遭遇到了史无前例的整体性危机并非过分，它是当代人类在高科技发展条件下的盛世危言。与地球上别的物种不同，人类有能力给自己制造和谐与愉快，却偏偏给自己制造麻烦与乱局。我们自己把自己誉为“万物之灵”，这就堵死了我们向自然界其他物类学习的路径。

由此看来，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具有高远志向和“世界眼光”的人才，需要对“人类精神的第二次觉醒”具有自觉意识的人才。然而现代教育制度总是从专业着眼培养人才，学科分类繁琐，专业过于细致。急功近利的、如生产螺丝钉的机械式的批量生产的人才，往往缺乏一种“人类目

① “山羊”胡子一翘，了不起啊！群体领袖啊！“我”就是中心。可是过了一会儿，夹着尾巴跑了，那边狼来了。“山羊同志，慢走！”

光”，缺乏对人类终极前途思考的胸怀与志向。这种情况的改变，需要老师与学生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在这里，李提摩太依然“在场”：他的精神世界与人生实践皈依于上帝，而我们同样需要“皈依”，“皈依”于对人类终极前途的关怀精神。像何菊这样的年轻博士与青年学者，应该有一种“新新人类”的自觉意识；在当下，他们正处在一个学术起点之上，目光该往哪个方向看，是值得重视的。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何菊以一句“朝闻道，夕死可矣”作结，一语既出，满座皆惊。这一次的“后记”中又引佛教经典“志与道合者大”自勉，愿能终生践之不渝，是所望焉。

朱炳祥

2014年8月25日于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

目 录

引子	(1)
导论	(4)
第一节 研究背景	(4)
一 “冲击—回应”:解释中国社会变革的外部模式框架	(5)
二 “中国中心观”:解释中国社会变革的内部研究视角	(6)
三 后现代思想对解释中国社会变革的启示	(8)
四 关于传教士与中国社会的研究综述	(9)
第二节 研究的意义	(11)
第三节 研究的理论视角	(13)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材料	(17)
一 文本资料中的田野工作	(17)
二 历史人物的个案研究	(20)
第一章 基督教传教士入华的历史背景	(22)
第一节 19 世纪 60 年代前的中国与世界	(22)
一 西域交通时期	(23)
二 海上交通大发展时期	(25)
第二节 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发展	(29)
一 宗教改革运动及基督教发展新特点	(30)
二 基督教的海外传教事业	(33)
三 基督教入华的进程	(36)
第三节 中国历史上的外来宗教政策	(39)
一 秦汉至明代以来的中国外来宗教政策	(39)

二 清朝的基督教政策	(42)
第四节 李提摩太入华传教的社会条件解读	(47)
第二章 救赎大众:李提摩太与中国地方社会	(50)
第一节 从游历到定居的在华生活	(50)
一 初到烟台摸索生存	(50)
二 宁海城和青州城的租房风波	(52)
第二节 山东、山西两省的赈灾活动	(55)
一 “丁戊奇荒”期间山东和山西的灾情与官赈概况	(55)
二 李提摩太倡导的国际性赈灾行为	(67)
第三节 李提摩太深入中国地方社会的行动逻辑	(88)
第三章 宣传西学:李提摩太与中国中层社会	(92)
第一节 为传播西学积累受众群体	(92)
一 针对官员和学者的西学演讲	(92)
二 与官员、学者的社会交往	(94)
第二节 主事广学会	(97)
一 阻力与新机遇	(97)
二 常规工作	(100)
三 争取晚清政治精英的支持	(105)
第三节 李提摩太对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文化渗透	(110)
第四章 顾问政治:李提摩太与中国上层社会	(113)
第一节 李提摩太与维新变法运动	(113)
一 联络维新派与晚清政治精英	(114)
二 参与维新派组织活动	(121)
三 挽救维新失败的危机	(123)
第二节 李提摩太与庚子新政	(124)
一 教育办学以平息教案、推进改革	(125)
二 与晚清政要论辩新政	(130)
第三节 李提摩太与辛亥革命	(133)
一 反对暴力革命:对孙中山的劝说与评价	(133)

二 赞赏与失望:对袁世凯的双重态度	(135)
三 “尚贤堂”的改革讨论	(136)
第四节 李提摩太与中国社会上层精英的政治共谋	(137)
第五章 勾连世界:李提摩太与国际社会	(141)
第一节 宗教性的国际活动	(141)
一 为在华基督教传教事业争取国际支援	(141)
二 考察亚洲地区基督教传教工作	(151)
三 寻访亚洲的佛寺	(151)
第二节 倡议推进和平运动	(153)
一 在满洲建立国际红十字协会	(154)
二 宣传王子和平联盟观点	(155)
三 建议成立多国联盟组织	(156)
第三节 李提摩太纵横联结中国与国际社会	(159)
第六章 传播福音:李提摩太与中国基督教	(162)
第一节 传教方式的探索	(162)
一 三种布道形式	(162)
二 两个传教计划	(164)
三 文字工作	(174)
四 宣教成果	(177)
第二节 教会管理工作	(178)
一 指导与组织教徒	(179)
二 教会基地建设	(181)
三 促进在华基督教传教士联盟的形成	(182)
第三节 争取在华基督教合法性的努力	(185)
一 福音联盟的成立与面见英国公使	(185)
二 代表教会上书北京	(186)
三 被朝廷任命为新教差会的代表	(190)
第四节 接通基督教与汉化佛教	(191)
一 早期的佛教接触	(192)
二 参观中国佛教名寺	(193)

三 深入了解大乘佛教	(196)
第五节 李提摩太践行的基督教本土化	(201)
结论	(203)
一 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的有限选择	(203)
二 内部的他者	(207)
三 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机制与特点的思考	(209)
主要参考文献	(212)
后记	(219)

引 子

受到一场有关中国的传教运动的鼓动，一位年仅 25 岁的传教士离开大不列颠群岛（The British Isles），漂洋过海到达东半球最伟大的帝国。他从神学院毕业不久便自愿加入海外传教士的行列。他将在华传教——在历史悠久且有着高度复杂文明的神秘帝国建立起上帝的人间天国——视为一项神圣而重要的工作。他以自己的方式在大清的城市和乡间生存下来。通过长期的基层调查、结交社会上层人员、开展广泛的文字传播工作，他逐渐进入大清帝国的精英社会，试图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为上帝征服这个骄傲的国度。凭借不懈的努力，他主持的报刊成为清朝读书人了解世界的窗口，他的文学翻译工作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古典名著转化为基督教（Christianity）哲学寓言故事，他利用庚子赔款在山西兴办新学，他甚至被推荐为光绪皇帝的外国顾问人选之一。然而时局动荡、政权更迭，在中国结束帝制建立新兴国家之后，他因年老疾病缠身而返回英国。历史给予他许多机会，也让他失去了很多机会，但他的确成为基督教在华传播历史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这个传教士就是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英国基督教浸礼会^①（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著名在华传教士之一。他出生于英国威尔士（Wales）卡马孙郡（caermarthenshire）法尔德普林村（Ffaldybrenin）一个农场主家庭。这个传统威尔士家庭很有宗教氛围，李提摩太的一个堂兄约书亚·刘易斯（Joshua Lewis）是地方上一位著名的牧师，父亲和外祖父是地方教堂里的秘书和执事。1858 年到 1860 年西方

^① 英国浸礼会产生于 17 世纪初对清教徒的镇压活动，部分牧师信徒流亡英国国内和荷兰，单独成立教会，因为他们反对婴儿受洗礼，主张教徒成年后才能受洗，受礼时教徒应全身浸入水中，因而被称为浸礼会。其教会组织制度采用公理制，反对教阶制和教区制。

世界发展了如火如荼的宗教复兴运动，在此期间李提摩太接受洗礼加入浸礼会，很快就萌生了从事传教工作的念头。随后五年李提摩太在乡村学校担任老师，积累了许多教学经验，1865年他进入朋布洛克郡（Pembrokeshire）的哈弗汾西（Haverfordwest）神学院接受教育和训练。当时中国内地会^①（China Inland Mission）充满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传教事业深深地吸引了这位年轻人。随后，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协会也对向中国传教的计划产生了强烈的共鸣。1868年在临近毕业的时候，年轻的李提摩太向浸礼会传教协会提出前往中国传教的申请。

1870年李提摩太抵达中国山东烟台，开始布道工作。他在这个港口城市初次体验了中国的魅力，几年后在山东半岛的一个内陆城市定居下来。传教工作的艰难并没有吓倒他，而是刺激他不断地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1876年适逢百年难遇的旱灾和饥荒，李提摩太组织并参与了山东、山西的赈灾工作。几年的在华生活经历使李提摩太对中国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他慢慢将传教的对象集中于中国的社会精英，从圣洁的传教神坛走向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从而施行新的传教方式。

赈灾工作结束之后，李提摩太花了四年的时间集中向官员和学者宣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渐渐进入中国上层社会的生活。1891年基督教出版组织广学会（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请他继任总干事一职，英国浸礼会也支持他接受这份新工作。正是广学会的工作将李提摩太带到了中国政治生活的前台，担当起对中国民众进行西学启蒙的使命，影响了一大批读书人。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和其他书籍引起了清朝高级官员的关注，为李提摩太争取到与中国政治核心人物交往的机会。到维新变法兴起时，他与部分中央官员、维新派人士交往甚密，差一步便成为光绪皇帝的外国顾问。义和团运动之后，为平息教案，李提摩太受政府委托筹备并管理山西大学长达十年之久。此后，步入老年的李提摩太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各种国际访问、宗教会议，以及世界和平运动等联结各个国家与地区的活动中。

1916年李提摩太因健康问题返回英国休养，1919年4月17日因病去世，原定1919年秋再次前往中国的计划未能如愿以偿。这位基督教传教

^① 中国内地会是基督教在华传教团体之一，1865年成立于英国伦敦，1872年在上海设立总部，创始人是英国传教士戴德生（Hudson Taylor）。

士一生坚持信仰、铎巡中华，他的事业终于在晚年得到认可：美国、英国先后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而清朝授予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①

笔者选择李提摩太在华生命史中的各种事件作为具体事例进行研究。李提摩太来到中国最根本的任务就是传播福音，发展中国的基督教，因此宗教活动是本书的基本内容，与此相关的社会活动也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在山东定居后，他参与了华北的赈灾工作。就在这段时期，李提摩太接触到大清帝国社会结构，并介入其中。在总结这一时期实地考察和各种社会经验之后，他转变传教策略，进入清帝国政治领域，用自己的基督教思想和西方文化为中国设计新的社会蓝图，从发行报刊到兴办学校，再到顾问变法，一次次将自己的宏大计划付诸实践。直至清帝国崩溃、李提摩太去世时，传教士仍未完成征服中国的使命。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将定居生活、建立传教基地作为起点开始他们在中国的征服之路，通过参与社会活动深刻地介入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接着从社会的各个方面对中国进行改造，这些活动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各种不同的结果。

李提摩太与近代中国社会交汇的这段历史中，传教士亲身参与了中国社会的变革。李提摩太以传教士的特殊身份，一方面不断地将外部世界的要素带入中国社会，使之与中国内部本身的社会变革要素相结合；另一方面身处中国的他本身就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一种内部力量，通过这两个方面的作用，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将中国社会变革的外部动力转化为内部动力，推动了社会变革的进程。因此，原本属于外部他者的传教士扮演了中国社会“内部的他者”的角色，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在此基础上，本书总结了西方文化影响下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机制与特点，指出外来因素按照中国社会的结构秩序介入中国人的生活世界，被中国社会文化包容和吸纳，互相整合之后激发新的社会力量，促成社会发生巨大变革。

^① 参见[英]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附录，第372页；[英]苏慧廉《李提摩太在中国》，关志远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5—306页。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中西方社会文化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转折，变革的浪潮激荡着社会的每个角落。那么，究竟应该把中国社会的变革看作是对来自西方等外部世界的冲击之回应呢，还是强调中国社会变革是其自身内部世界变化的结果？或者干脆冲破这些非此即彼、内外二分的看法而另辟蹊径？将传教士看作是西方社会文化的一类要素，讨论传教士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关系，也面临着类似的疑问。

笔者回顾相关研究成果，梳理由外向内和立足内部的具体研究模式，包括后来的学界对这些研究模式的发展与批判。由外向内的研究模式主要有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传统—现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后面两种模式对冲击—回应模式进行了发展和延伸，没能跳出已有的框架，因此将它们都放在冲击—回应模式下面讨论。之后学术界对三种模式进行反思，提出了在中国社会内部研究问题的“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后现代理论的兴起，启发学者们批判冲击—回应等模式中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观点，并尝试选取独特的视角跳出冲击—回应等模式和“中国中心观”的限制，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中西方国家政治秩序、权力、话语的互动，以解释中国与西方相遇后冲突产生的原因，为寻找中国社会变革的模式提供参考。综观关于传教士与中国社会的研究，其解释模式基本上没有跳出冲击—回应模式的框架。完成相关文献综述之后，笔者将对解释传教士与中国社会变革关系以及寻找中国社会变革新模式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